

为何  
反主流文化  
变成  
消费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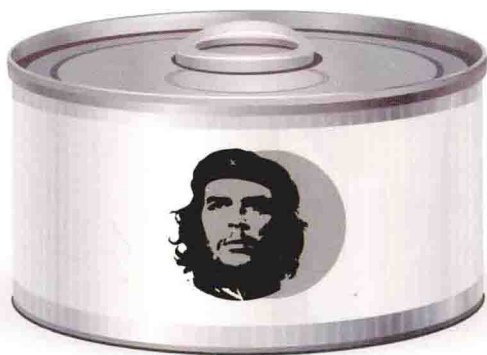
JOSEPH HEATH  
ANDREW POTTER

[加] 约瑟夫·希斯  
安德鲁·波特  
——著

张世耘  
王维东  
——译

# THE REBEL SELL 叛逆国度

WHY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



反主流文化虽然以鲜明的态度反对资本主义，  
却成为消费文化的助燃氧气。

〔加〕约瑟夫·希斯  
安德鲁·波特  
—— 著

张世耘  
王维东  
—— 译

# THE REBEL SELL 叛逆国度

WHY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

JOSEPH HEATH  
ANDREW POTTER

为何  
反主流文化  
变成  
消费文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叛逆国度：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加)

希斯(Heath, J.), (加) 波特(Potter, A.) 著；

张世耘、王维东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8

书名原文：The Rebel Sell Why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

ISBN 978-7-5327-6532-4

I. ①叛… II. ①希… ②波… ③张… ④王… III.

①文化-意识形态-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11②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9330 号

## THE REBEL SELL: WHY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

by JOSEPH HEATH & ANDREW POTTER

Copyright: © 2004 BY JOSEPH HEATH & ANDREW POTTER, 2005 P. S. SECTION

BY JOSEPH HEATH AND ANDREW POT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CANAD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iaiso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4-124(1)

叛逆国度

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

The Rebel Sell;

Why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

Joseph Heath Andrew Potter

约瑟夫·希斯 安德鲁·波特 著

张世耘 王维东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付 焱

装帧设计 高燕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c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4.25 插页 2 字数 237,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532-4/C·060

定价：5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218653

# 叛逆国度

献给我的父母

——安德鲁·波特

献给阿斯特丽德

——约瑟夫·希斯

## 译者序

反主流文化的主张在西方世界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想中就有其踪迹，及至二战之后，尤其在美国，随着消费商品日益丰富，物质追求主导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人们沉迷于消费商品和商业化大众娱乐。在此背景之下，五十年代的所谓“垮掉的一代”推动了一波对抗主流价值的文化浪潮。“垮掉”的叛逆弄潮儿对现实深恶痛绝，他们挑战传统社会规范，寻找新的生存价值，他们尝试毒品，追求无拘无束的性爱，着装打扮标新立异，行事一味地张扬自我、无视常规；他们热衷于爵士乐、佛教禅宗等另类精神生活，乐于体验新奇事物，通过徒步旅行开阔见识。到了六十年代，嬉皮士们接过叛逆的旗帜。他们同样反对传统价值和现有体制，主张改变和实验，质疑所谓“美国梦”和泛滥的消费主义；他们关注种族、女权、越战等议题；他们使用迷幻药物、大麻，借此扩展意识的极限；他们崇尚自发的冲动、自由的性爱和真实的自我表达；他们身着奇装异服，留着长发；他们热衷音乐新潮——布鲁斯、摇滚，披头士、滚石乐队都是他们追捧的对象。然而，嬉皮士后来变成了雅皮士，叛逆变成了主流。这又是怎么回事？“涅槃”乐队的灵魂人物科特·柯本也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自己的音乐竟然从另类变成了主流，成了自己曾经反对的“体制”。叛逆变主

流的循环似乎永无休止。我们能够解开这个谜团吗？

说到反主流文化叛逆思潮，常常会涉及相应的大众文化批判论点。十九世纪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先行者。在他看来，作为完美、光明、理智化身的文化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抵牾”，因此传播文化的人很难被大众认同，“而不会有人把他们当成朋友和恩人”。<sup>①</sup>这样，文明被区分为“虚假”的文化和“真正”的文化。在此二元区分中受到批判的文化是所谓“英式的自由”、“英式的工业”等这些被当成目的崇拜的工具和手段，而这只是过度崇尚物质生活的“拜物教”而已。<sup>②</sup>同样，二十世纪英国文学评论家 F·R·利维斯从阿诺德的立场出发，同样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立起来，他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这本小册子强调，前者是工业化机器生产方式和商业社会的产物，其特点是平庸、媚俗、商业化，而后者只属于“很小的一个少数群体”，在任何时代，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欣赏都有赖于少数精英，只有他们才能做出“无须提示的第一手判断”，这就像“纸币公认的价值依据是极少量的黄金”<sup>③</sup>。机器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大量生产和标准化过程侵入了报刊、广播、电影等领域，其产品只是“被动型精力转移的工具”，这使“自主身心调节，尤其是自主思想活动更加困难”。工业化生产威胁到文化的生存，利维斯的担忧溢于言表。

要说深入批判大众文化，必然要说到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起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德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

---

① [英]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12页。

② 同上，第130—132页。

③ F. R. Leavis,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The Folcroft Press Inc., 1930) 3-4.

所，其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斯·霍克海默、希奥多·阿多尔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在三十年代纳粹掌权后流亡到美国，开始关注大众文化。该学派社会批判的焦点从经济、政治体制等传统研究对象，转向社会总体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需要优先关注的问题是维持体制现状的文化模式。按照他们的思路，意识形态在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超越阶级界限，对社会所有成员形成了全面心理控制，表现为启蒙精神的异化。西方文明进程中的种种社会事件和现象——世界大战、纳粹暴政、传媒意识形态控制、原子弹、军备竞赛，甚至工业化对个性的扼杀——他们看到的这些都表明，西方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并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和幸福。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使用启蒙一词，意指“最广泛意义上的进步思想”，人们用以“摆脱恐惧，成为主人”，目的是“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然而，主体掌握的科学技术却主宰了主体自身。理性作为工具，同社会进程紧密结合，成为统治自然和人的惟一标准。理性沦为技术操作，表现为统治和现实合理化的抽象规则。一方面，社会进步和技术的运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使社会统治自然的技术能力日益加强；另一方面，个人虽然得到了技术发展的好处，但同时也日益受到无形技术管理的操控，随着启蒙理性思想退化为工具理性，虚假大众传播和精心设计的商业文化产品更是将大众意识玩弄于掌股之中，使之愚钝、麻木。在经济和管理高度集中的发达工业社会，大众文化千篇一律，其框架结构以工业化方式生产制造，通过专业技术整合生产过程，与经济的其他部门协调、关联，形成产业的“完全统一”和政治上“内聚的统一性”，消费群体是生产计划的统计对象，分门别类设定为产品的消费群对象。如此模式生产的产品也总是同一的。书



中使用了“文化工业”一词替换原稿中“大众文化”一词，其意思是，“按计划大量生产的产品为大众消费而量身定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的性质”。

文化工业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和集中管理体制，“自上而下、有意识地统合消费者。文化工业迫使数千年来泾渭分明的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合二而一，两者同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被破坏殆尽，在整体社会控制的现实条件下，通俗艺术原本内生的叛逆反抗特点也由于文明社会体制强加的限制而不复存在。大众消费者被说成是上帝，但实际上不过是文化生产机器的附庸。“文化工业复制、巩固、强化大众思维模式，……自始至终排除任何改变思维模式的可能性，最终的裁判者不是大众，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大规模生产文化工业产品的目的，消费者或许能够意识得到，但却愿意享受转瞬即逝的消费欲望满足，因为他们明白，一旦放弃这样的虚假满足感，生活将完全无法忍受。文化工业的“绝对律令”是：你必须要和现有秩序保持一致，要和所有人的想法保持一致。这样，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所强加的整齐划一取代了自主意识。<sup>①</sup>“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sup>②</sup>原本是“通过技术进步主宰自然的启蒙传统变成了大众欺骗，转化为禁锢意识的手段”<sup>③</sup>，后果是对启蒙精神的压制。同时，泛滥的消费主义文化和平庸、低俗的商业化娱乐导致大众沉溺于虚幻的美好生活期望之中，从而丧失了改变社会体

---

① Theodor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J. 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1991) 98 - 99, 103 - 104.

② [联邦德国] 马克斯·霍克海默，希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③ Theodor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J. M. Bernstein (London: Routledge, 1991) 106.

制的动力。

文化批判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很容易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中找到契合点。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得以建立,个人的原始冲动(包括性欲和攻击性)必须加以控制,以便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群体的行为规范。然而,原始本能并没有真正消失。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用罗马城作为比喻,一个具有渊博历史和地形知识的游客,徜徉在今天的罗马城街区,面前的大都市经历了战乱、破坏和重建,但是如果他仔细寻访,仍然可以找到混杂其间的古城遗迹,甚至发现一些旧址的残垣断壁。人们的精神世界如同罗马城一样,保留着精神历史的痕迹。原本人们一味追求快感体验,回避痛苦,行事只是遵循这样的“快乐原则”。然而,文明社会的必要规范不再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快乐原则也必须由“现实原则”取而代之。而现实原则迫于生存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得失计较,必然对本能欲望做出相应限制。也就是说,在我们貌似文明的表象之下,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内心一角,深藏着强行压抑着、但不可能消除的野蛮本能冲动。原始本能(“本我”)无可避免地与外部规范或内在化规范(“超我”)处于紧张对立状态。而为了公共利益,个人的原始欲望不得不改头换面,“升华”为社会可以接受的替代形式,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性欲的能量(“力比多”)“舍却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社会的目标”<sup>①</sup>。或者说,人们为适应外部环境,以不同行为应对,将“力比多”转向替代性欲望满足,比如专业工作、艺术创作、科学研究等,以逃避痛苦。一方面升华代表文明的成就,另一方面,升华就意味着压抑。也就是说,文明建立于压抑本能欲望之上。性欲只限于服务生殖目的,同时,与性欲本能共存、对立的

---

<sup>①</sup> [奥]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页。

“死亡本能”或攻击性本能则被文化戒律转化为个人的负罪感。这样，个人也会失去快乐感和满足感。弗洛伊德暗示，对压抑导致的神经症诊断，也可以适用于整个文化群体。

马尔库塞接受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但他认为，压抑本能更多是出于统治(主宰)的需要，而发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理解为“心理经济学”。他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提出所谓“额外压抑”的概念，指“社会统治的必要限制”，以此区别于“(基本)压抑”，后者指“为长久延续文明人类，对本能做出的必要‘改变’”。<sup>①</sup>马尔库塞重新解释了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认为其内容必定取决于统治权力的利益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条件，并据此“改变”对本能欲望的限制形式。而具体历史时期的各种机构和具体的统治利益在文明必要的本能压抑之外增加了额外的本能压抑。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延续现行统治，使统治合理化，而意识形态维系着生产和消费。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必然额外压抑本能使其符合现行统治利益。而在总体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个体意识日益丧失自主性，只能起到使个体与整体相协调的作用。意识由于受到操纵并不能感受到压抑性意识形态对自身的限制。在“强大的教育机器”和娱乐的作用下，个人和所有其他人联合在一起，社会整体处于普遍的麻木状态，所有有害想法也都被排除。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无论是雇主或是雇员，资本家或是工人——他们的生活和需要都受到“体制”的操纵，他们都是牺牲者。对弗洛伊德来说，文明和压抑必然形影相随。与之不同，马尔库塞的额外压抑概念却指向“非压抑文化”的可能性：本能(性欲)真正从现有体制强加的额外压抑中获得解放，并且其“领域和目的”也从狭义性爱

---

<sup>①</sup>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eacon Press, 1974) 35.

拓展到更加广义的“爱欲”。

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提出，在发达工业文明中，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自由概念不再适用于判定社会是否自由。实现自由社会的新模式“只能以否定现有模式的方式来表达。因此，经济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经济——不受经济力量和关系的控制；不受制于日常生存斗争，不受制于谋生需要。政治自由意味着解放个人，不参与他们无法实际控制的政治生活。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目前被大众传播和灌输所同一化的个人思想，消除‘公众舆论’及其制造者”。<sup>①</sup>获得解放的最主要障碍是植入人们头脑中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然而，个人需求的满足带来快乐感，人们又如何愿意放弃追求需求的满足呢？马尔库塞区分出了“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真实需求是必要的需求（除了“营养”、“衣服”、“住所”几个概念含混的需求之外，马尔库塞并没有明确列出“超越历史条件”的需求），而“大多数受广告影响而流行的放松、娱乐、行为和消费形式，爱他人所爱，恨他人所恨”则属于虚假需求一类。虚假需求是压抑性需求，是因社会统治需要而强加给个人的。对此，大众浑然不知，或无奈接受，这是因为发达工业文化通过交通、通信工具、消费商品、娱乐和信息工业，为大众规定了一整套生活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使消费者、生产者和整个制度体系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捆绑在一起。大众被灌输了“虚假意识”，自然无法察觉虚假现象。要想摆脱虚假需求压抑、获得肉体 and 心灵的独立自主，就需要批判、拒斥现有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马尔库塞从个人反抗的角度批判文化，类似思路的文化批判者相信，“个人完全具有实际能力对自身的异化做出判断并加以改变，最终可使我们

---

<sup>①</sup>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eacon Press, 1964) 3-4.

在这些众多的自我解放的行动基础上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sup>①</sup>且不论个人或小团体的反抗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何种作用，马尔库塞的本能解放理论的确对五十年代众多美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

反主流文化运动历经潮起潮落，其内涵宽泛无常，但其精髓却始终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如影随形。在资本主义文化向全球渗透的过程中，反主流文化思想或是象征也随着美国大众文化产品在全球的营销而成为我们见怪不怪的新潮事物，甚至成了新兴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时尚。一方面我们的青年文化对时尚叛逆风格趋之若鹜，另一方面却往往对于其内涵茫然无知；一方面《美国丽人》、《黑客帝国》等美国影视产品为我们所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却常常对其内在逻辑和本意不甚了了。同样，在大学校园里，消费主义、广告、时尚周期等现象和消费文化批判可以是热门话题，但我们听到的一些批判假设前提或形而上学结论往往多于我们对西方相关现实的了解，难免堕入脱离事实依据的文化误读。无疑，反主流文化现象引出诸多关注、疑问、迷思，甚至误区，对此，《叛逆国度》的作者以活泼、幽默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方式一一作出分析。反主流文化叛逆者认为，通过个人或小团体形形色色的叛逆行动，就可以“扰乱”主流文化，最终使其总体系统彻底瘫痪。作者从行为规则的作用、主体间交往或交际行动心理、经济理论、消费行为动机、时尚周期等诸多角度考察西方文化中层出不穷的反主流文化叛逆现象和相关论点，既有理论探讨，又绝不踏入文化批判凌虚蹈空、游戏抽象思辨的窠臼。作者承传了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学理进路，观照、反思、批判其代表人物的论点及社会批

---

<sup>①</sup> [加]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62页。

判传统。该书的一些主要内容，略作如下评介。

要想知道反主流文化的前因后果，就要厘清其思想基础的来龙去脉。电影《黑客帝国》是反主流文化叛逆思想的典型代表。其思想来源之一是居伊·德波的“景象”论。在德波看来，我们的经验世界并不是真实的，因为消费资本主义把人类经验转化成商品，然后再通过广告和传媒重新贩卖给我们。人类生活成为“景象”，一个受制于其内在逻辑的符号系统。“景象就是资本”，而我们的生活体验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幻象。我们生活中的需求并非真实需求，而是体制强加给我们的。因此，要想找到真实的生活，就必须抵制整个虚幻文化，要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那样，作出选择。

按中国传统思维，如此否定经验生活的说法相当奇特，但是看一看西方思想传统，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古希腊哲人如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都否认感官经验世界的真实性。我们相信“眼见为实”，而柏拉图却把可见世界视为真实的虚幻映像，至善至真只能存在于精神的理念世界。尽管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将知识的基础建立在经验世界的具体事物之上，但最终还是将感官经验当作留在心灵上的“印记”，而非事物本因。毕竟，古希腊哲人孜孜求索的是现象背后的本体。现代西方哲学之父笛卡儿也未跳出传统的窠臼，物质世界必须要经过理性推论的证实，否则无法确知我们的所见所闻是否梦中幻觉。唯理论者如此，经验论者洛克也认为无法确认通过感官获得的观念与外在事物相一致，而休谟则干脆把“印象”——也就是原初的知觉或洛克的感官观念——作为惟一确知的存在，使知识成了毫无外在根基的一堆知觉。

不难看出，在这样的思想传统中，“景象”说一类论点不但并不稀奇，而且对社会批判者来说颇具说服力。要想穿透幻象之幕，就需要制造干扰的杂音，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既然整个文化呈现的

现实只是一个认知领域的意识形态系统，那么，抵制整个文化就可以破坏这个意识形态认知，这也是摆脱资本和机器的暴政，逃离柏拉图的“映像”洞穴走向真实世界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遵循传统文化规范的主流社会就是叛逆者抵制的对象。这使我们想起前面介绍西方文化批判思想时提起的精英文化倾向。从阿诺德到利维斯，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他们对主流社会持批判、反对的态度。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解放愚钝的大众，舍我其谁？如此看来，朋克摇滚乐手柯本的自杀在作者的描述中显得颇具象征意义。原本“另类”竟然成了畅销的主流，在《公告牌》杂志排到了第一名。对于他的自杀，作者的解释是：他无法接受另类成为主流商业音乐的现实，只能以死“摆脱绝境”，避免最终背叛自己的原则。不幸的是，他的原则不过是个幻觉。压根就没有什么主流、另类的区别！柯本自称“反嬉皮士”，因为他们成了“虚伪士”，背叛了自己的原则。这样的“另类”反“另类”不断上演，为的是坚持反主流的原则。或许，柯本之死，向我们揭示了批判理论面临的一个类似困境。既然“整齐划一取代了意识”，所有个体被塑造成一个整体，意识形态构成一个无所不在的虚幻网络，一个“虚假的整体”，那么，只有自外于社会的个人才有能力与之对抗。“所有社会交往和参与的人性价值都不过是在掩饰对非人性的默许”，阿多尔诺如是说<sup>①</sup>。抵抗社会最终成了批判思想者个人自说自话的思辨游戏。这无疑将社会批判逼入了类似柯本的“绝境”。无独有偶，以拒斥西方意识形态为己任的文化批判理论同样被纳入了西方学术的主流，其学术地位也为“体制”所认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否也意味着，一些文化批判者的乐观想法，认为“个人完全具有实际

---

<sup>①</sup> 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on a Damaged Life*,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Verso, 2005) 26.

能力对自身的异化作出判断并加以改变”，同样难逃“绝境”呢？

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另一个迷思是把社会整体看作一个压抑系统。这一思想来源于弗洛伊德。人们能够按社会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但代价是欲望受到压抑。强加于人的社会规范对本能欲望的控制会使本能或者封闭于内心，或者“升华”为社会允许的行为，作为替代性欲望满足。文明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这在西方也是老生常谈。卢梭赞誉自然状态中尚未受到教育和社会污染的人，将其称之为“高尚的野蛮人”，因为在他看来，科学和美德互不相容。洛克也把前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形容为“完备无缺”，人们只是为了使纠纷得到公正裁判，才放弃部分自由，通过“社会契约”，组成社会。弗洛伊德的论点则更进一步，认为人类进入社会的代价不仅仅是丧失自由，而且还要压抑自己的本能，从而丧失体验快乐的能力。

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理论的许多概念已经成为西方通俗心理学常识，以至于人们往往忘记这不过是一个理论假说而已。同样，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批判大众文化，颇具亲和力，奥斯卡获奖影片《美国丽人》就是一个例子。影片中的角色分为两类：一类人本性受到压抑，他们过分在意社会评价，不能容忍破坏规矩的行为；另一类人则是“好人”，他们吸食麻醉品，行为举止与众不同，与他人格格不入，能够享受生活中的美。男主角多年来一直循规蹈矩，按社会规定的生活方式生活，这使他丧失了享受快乐的能力。但是他终于觉醒了，开始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性欲，也不再遵从社会规范。当然，代表“体制”的前一类人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举止，而男主角的死象征着解放本性和社会体制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影片中的反主流文化批判行为是嬉皮士风格的，但其内涵却是灰暗的弗洛伊德压抑理论。在现代消费主义社会，人们要么延续青春期叛逆行为——吸食大麻、不务正业、不承担责任，也没有道德约束——要



么盲从主流社会，但无法真正享受快乐。二者必居其一。

其实，在中国，已经有人用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一些行为现象。不过一旦我们对弗洛伊德的一些假设、推论、分析有更多了解，许多人恐怕很难感到信服，且不说跨文化理念的障碍，所谓恋父、恋母情结，无法进入意识的潜意识，死亡本能，泛性论，不一而足，而这些，我们实在不易认同。不过即便在西方，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人们大多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要说那些极具争议的基础论断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的大学生通常认为弗洛伊德是一派胡言，但同时却能够多方运用他的概念深入分析各种文本中的人物行为和象征意义，有时还颇有新意。一方面，学生们说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荒谬”，另一方面，用他的方法分析文本却可以做得有声有色。<sup>①</sup>西方文学、影视作品评论家同样常常应用心理分析解读作品。文化批判者解读文化现象也不例外，更不要说文学家在创作中运用弗洛伊德的理念了。我们大概没有太多理由相信，他们与学生们必定截然不同，对弗洛伊德百分之百地信服。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人心难测，科学的进步也难以真正帮助我们进入心灵的“黑匣子”，找出形形色色，甚至不可理喻、“病态”行为的前因后果。这很无奈，但心理分析方法毕竟可以是行为和心理的一种合理解释。文学艺术作品、文化批判也会采用这一视角。不过，解释是一回事，给解释赋予解释之外的总体批判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况且，这还是一个远未获得共识的解释，且不说其蕴含诸多可疑、“荒谬”的假设了。当然可以争辩说，所有获得共识的事物是“虚幻”的，正是文化批判所要抵制的。的确，所有文化造物或许都可以被理解为“虚

---

① 参见 Arthur Asa Berger: *Culture Criticism* (Sage Publications, 1995)132。